引　　子

20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1]，他们代表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刘仁静也是被唤醒的几万万人民中的一个。他在这股席卷亚洲的民主革命潮流初入中国时来到人间，又为这股在中国很快转为新民主革命的潮流裹挟着进入社会；他曾走在潮流的前列，又曾自外于潮流。他的一生既表明投身革命潮流不难创造亮丽的人生，又证明脱离革命主流只能留下苦涩的回忆。无论是作为革命迅猛兴起的见证，还是作为道路选择失误的教材，他漫长的一生都能映照出历史潮流的不同侧面；无论是作为顺流直下的青年，还是作为落荒而走的败将，他复杂的一生都能引起对人生道路的有益思索。毫无疑问，他本身就是一本值得从各方面去读的书。

本书是如实解读刘仁静的首次努力。本书力求深入分析史实，再现他的精神风貌，全面展示他富有教益的一生。本书对深入的要求是：不仅了解他走的实际道路，而且了解他的思想线索及转折点，不仅揭示他的发展轨迹及其必然性，而且挖掘他的内心矛盾及其特殊性。本书对全面的要求是：同时深入认识他的历史处境及他在其中所作的历史选择；不了解历史环境的全部复杂性，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能真正了解人的选择的全部历史含义，不着眼人选择的全部主观过程，也不能真正了解历史给予的全部考验。

本书视他一生为三部曲：在激流中搏击奋进——在迷惘中摸索闯荡——在曲折中寻找自我。

注　释

1 《列宁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8 页

第一章

迎向新潮流

童　　年

1902年 3 月 4 日，刘仁静诞生于湖北应城。他的祖上开过小杂货店，因经营无方而停业。他的父亲刘世芳无力重振家业，考中秀才后就在家里办了个私塾，改以教书为生。他的母亲吴氏是文盲，温顺的家庭主妇。这个由古板秀才和小脚主妇组成的守旧家庭，显然只能按照传统去要求长子刘仁静，而在他们心目中，光大门庭的传统要求，无非是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功。所以，刘仁静 3 岁时就开始发蒙识字，背诵“子曰，学而时习之……”之类，后来更正式进入了学《四书》学《左传》的行列，成为他家设私塾中最幼小最特殊的弟子。这么小就接受这么严格刻板的教育，对聪敏又孤独的刘仁静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发展成不爱嬉戏只爱读书的少年老夫子，每天除背规定的功课外，还迷着读些《施公案》、《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说岳》、《粉庄楼》之类旧小说。这种丰富的课外阅读很有效地弥补了他的旧式教育。下面的事可以反映他当年的学习成绩：他不到 10 岁时,曾应邀充当“枪手”，替别人代考县立高等小学。按当时人的观念，考县立高等小学相当于过去考秀才，考省立高等学堂相当于考举人，考京

师大学堂相当于考进士。小小的刘仁静当时就代人考取了，后来他自己也考进去了。

刘仁静在家闭门读书并不能使他置身于历史潮流之外。那时的应城虽是一个落后的小县，但因离汉口不远，走水路一天可到，又因出产石膏，有“应城有三宝：汤池、石膏、灵芝草”之说，所以不算闭塞，时代新潮常能稍稍波及。例如维新派的主张对这个小城就并不陌生。这其中，戊戌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兴学堂无疑是对教书先生谋生之道的重大威胁。变法失败了，京师大学堂却未撤销，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日见其多，这一切使刘世芳不能不考虑如何适应形势。为此他买过一部《皇朝经世文编》，却没有想到这部书竟成了他长子关注新思潮的导引：那时刘仁静拿起这部书，尽管许多地方读不懂，仍能一坐半天翻个不停，后来更发展到借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章炳麟主编的《民报》等等。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死读硬记不求理解的读书习惯，使这个 10 岁左右的孩子居然不管懂不懂就硬着头皮去啃薛福成的洋务议论、章炳麟的古奥文字。现在当然很难说这种生吞活剥的阅读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不过可以设想其中总有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启发他的好奇。无论如何，少年刘仁静睁大双眼看世界时，不管有多少地方看得模模糊糊、莫明其妙，但至少那些维新派、革命派的人名乃至言论中突出的片言只字，都已输入他的脑中，使他后来正式评判新旧两军对垒时，会感到新派并不陌生，也许还会产生某些熟悉而亲切的感情。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进一步推动刘仁静走向新潮流。表面上看，这个离武昌不远的小城在革命前后的变化微乎其微。 1912 年刘仁静剪掉头上的辫子，好像是这次革命唯一可以夸耀的直接成就。但是深入一步可以看到，新潮流在社会内纵深发展确实起了“彻底唤醒”刘仁静一家的作用。问题在于革命后科举道路也随着

清王朝一去不复返了，而废科举兴学堂对刘世芳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好在他早有所闻，可以算是有某种思想准备，尚能接受教育事业由旧而新的转化，他停办了家中的私塾，应聘进了县立商业学校任国文教员，同时也让长子插班进县立高小就读，并为其重新设计了一条适应形势的发展路线：他不再要求长子学好八股文，却转而要求学好洋文，以便将来能到邮局、海关之类地方去谋个金饭碗。这样一来，刘仁静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把自己的命运从此和新发展联在一起了。

刘仁静高小毕业后按计划应该进一所能学好洋文的学校。那时武昌大东门有个远近闻名的学校，虽取“博我以文，约之以礼”之古意，定名为“博文书院”，却根本不是古色古香的旧式学校，而是英国教会办的 Wesley College，是学好英文的理想学校，只是学膳费昂贵。刘世芳为了长子成龙，自己负担不起学费，不惜向人告帮，他终于取得亲戚的资助，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1914年,刘仁静首次离家,他带着 12 岁少年所能有的单纯要求和模糊憧憬，充满信心地走向武昌，并接着进一步走向他的青年时代。

博文书院是个提倡死读书的教会学校，确能培养出英语人才。当年刘仁静的同窗好友陈叔生（后改名陈友松）就是由此考取了官费，留学美国，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刘仁静在此求学也确实为他其后掌握英语打下很好的基础。但因无力每年筹足昂贵的学费，他在此坚持了两年后，不得不转到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去读三年级。

接触新文化运动

中华大学坐落在武昌粮道街，大学和附中在一个校园内，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模不大。校长陈时（叔澄）是个不到 30 岁的有钱公子，他出钱办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沽名钓誉，捞取政治资本。他后来迫不及待地去竞选议员，却被人控告虚报年龄（当时当议员有年龄限制），陷入了一场尴尬的官司中。不过这位年轻的校长虽然志不在教育，未请有名的教授，却因热衷于议会政治而多少给学校带来了某种自由空气。与关门读书的博文书院相比，这里显然更容易接触到新鲜事物。难怪这学校的教学虽然一般化，学生中却出了几个政治上的知名人物，其中既包括后来为革命献身的恽代英、林育南，也包括以反共出名的余家菊、陈启天等。刘仁静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也因在此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清新空气，再加上结交到理想的学友，能一扫心头的沉闷压抑，很快从一个倾向模糊的少年进到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

刘仁静是 1916 年秋考进中华大学中学部二班的。那时新文化运动初起，在武昌也不时能听到那些前驱猛士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这类远方的雷鸣电闪虽未曾在中华大学引起很大回响，但要在校园内找到有关材料却也不是难事。刘仁静在众多报刊中很快成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以及旅美的任鸿隽、陈衡哲、赵元任等人主编的《科学》、《太平洋》等刊物的热心读者。他年龄尚小，一下子面对许多使人眼花缭乱的议论，不可能立即把握其思想内容，并加以澄清理顺，而只能在浅表层面上吸取他尚能理解的部分。在文学上，胡适流畅的白话文使他产生莫名的喜悦，《甲寅》上文笔生动的文言文他同样十分欣赏。在思想上，陈独秀大声疾呼使他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心头混沌不清的愿望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反对尊孔，赞成妇女解放……1917 年他邀请一个同学回应城过暑假时，就曾站在新思想方面和同学展开热烈辩论。可惜这个涉世未深、年轻幼稚的新文化捍卫者，当时还只能理解那

些已经明白指出的思想，无力接受需要自己动脑筋领会的思想。他读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对人吃人的含义没有深切体会。所以确切地说，他是顺应潮流、被新文化运动所吸引，他思想上的同情支持，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含混不清的热情上。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进入了新阶段。《新青年》一开始不谈现实政治问题，集中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很合乎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深入的规律和中国青年从道德完善起步提高自己的实际。当年刘仁静就是通过参加恽代英的互助社，从提高道德修养起步，正式把自己与时代潮流联在一起的。以提高道德修养为任务的互助社本身，作为中国青年觉醒过程中的一个摸索和准备阶段，也确实能起到把奋发向上的青年引向时代新潮的作用。刘仁静进入青年时期，把自己已有的模糊倾向固定成比较明确的要求，为他其后选择人生道路定了大方向，这个重要的一步，完全是在互助社自发建成并逐步融入时代潮流的过程中实现的。

恽代英的抱负

刘仁静是在进中华大学附中的一年之后认识恽代英的，但他早就听说大学部有个高材生叫恽代英，不仅年年考第一，享受公费，而且才华出众，能经常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等，心里很佩服，有结识的愿望。后来听说恽代英组织了互助社，就积极参加了。1917 年 11 月 1 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刘仁静君，年少甚有志，然容貌甚黄瘦，岂用心过度欤？倘另有其他原因欤，吾必设法助之。今日彼加入互助社，观其发言，似真可为互助之友。此人或将于此社有益乎！"[1]就这样，刘仁静成了恽代英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长起来。

恽代英确实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有理想，有热情，思路敏捷，口才很好，作风踏实，一丝不苟。他善于思考，善于团结人，要求自己很严，有领袖风度，不愧为清代著名文人恽敬之后。他那时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以为靠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办法，可以把善良受苦的人结成能与恶势力抗争的善势力，并成功地建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界。所以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培养善势力上,还写过一篇题为‘一国善势力之养成’的研究文章。1917年暑期，他参加了基督教组织的庐山夏令营，很受教会活动的启发，决心回校后创办一个与人为善的社会团体。经过反复酝酿，终于在这年 10月间与同班好友数人共创以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

互助社是一个“愿入会者皆为会员”[2]的群众组织,会员须遵守八条戒约：(一)不谈人过失、(二)不失信、(三)不恶待人、(四)不作无益事、(五)不浪费、(六)不轻狂、(七)不染恶嗜好、(八)不骄矜。为了搞好这个组织，恽代英提出“从小处作起，务求可以计日程功”[3]的指导原则以及每日开会检查的办法，希望通过互相劝勉的每日例会，达到促人改正缺点共同提高的目的。恽代英的这些想法来自批判吸取基督教的祈祷和曾子的古训。他认为祈祷除迷信成分外还有自省成分，由此他想到曾子三省吾身，又想到“吾等每有立志，故不知三省，则久之此志若存若忘矣……吾决仿曾子三省吾身，务以省察切己易犯之病为主……此中有思过、知过、悔过，一切功夫在内……”[4]根据这个思路，互助社初创时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天开生活会检查思想，会上人人讲自己的进步（即自助）和已做或拟做的好事（即助人），并据此议决各类要求，从“不随地涕唾”到“无论他人待我如何，心中常须保存一平静态度”。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如作为一种从小处着眼的上进要求，大家都认真看待，也能营造出某种奋发自强的气氛，催

人天天向上。恽代英就是这样感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自加入互助社，身心受益匪浅，每日会毕余味弥觉可乐。”[5]“互助社之效益沦浃骨髓，吾自觉近来作事略有检束节制，又时时能克制妄想，并置一痰盂。”[6]

恽代英能由这类活动得益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毅力过人的人，坚持每天记日记，还给自己的表现打分。他严格要求自己是因为他有伟大的抱负。他说：“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但是，我不同不知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我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7]可见他在互助社不讲理想只讲修身并非因他没有理想，而是因他有意识避免亮出理想，只求以模范实践感动人、团结人、改造人。实际上，正因追求理想使他有从我做起的要求和努力提高的自觉，并使他推己及人以为互助社的活动对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与有志修己之人处，自然相观而善”[8]。他没有想到许多互助社成员仅有一个模糊的向上要求，他们不仅需要“修己”，更需要树立一个思想目标。当他们还没有达到恽代英那种自觉程度时，每天集会自我检讨是会因缺乏思想动力而成为负担难以持久的。

果然，过了不到两个月，每日例会坚持的人数开始减少，会议时间也开始缩短。刘仁静开始觉得此社不能有助于社员，徒为同学所笑。恽代英也不能不考虑“如此必渐至堕入有形式无精神的态度”,并决定‘吾意再观察数日,徐图补救。如果不出吾所料，当约数同志为最后之社员，仍以重精神不重形式为要。吾观同人皆在歧路之间。吾意明日当提醒同人，来此互助社所为何事？如所为之事不能求得，将改办法乎，或竟退会乎？”[9]后来的事态表明，幸赖恽代英之坚定及大家心齐，互助社才没垮。

所以有理由说，互助社尽管只强调修身，却不同于旧时的独善其身。当社会上浊流泛滥时，公开致力于自我完善，而且借助于集体努力，无疑是一种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斗争形式。几乎与恽代英发起互助社的同时，蔡元培也在北京公开以不当官、不纳妾、不打麻将的“三不主义”要求自己，后来又进而在北京大学组织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这表明这类形式的斗争原是应社会要求而生的，是与时代潮流相通的，历史只会给进行这类斗争的社团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不让它夭折，只促它随形势发展。

互助社的活动

后来，互助社在发展中改进了例会的开法，而且根据大家要求搞了许多丰富多采的活动。青年向往新生活却难以设想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互助社就组织参观一个留美学生的家庭，并讨论新的生活方式。青年好玩好动，互助社就在星期天组织郊游。恽代英对一次游汉阳的描绘是：“今日之游，沿途唱国歌及他种歌，去时高歌激昂，回时声稍低曼。又踢球为乐，兴味极佳。又所游多胜地而皆初到，旅行之有味，以此为冠矣。”[10]互助社还“注意利用音乐以感人”，“决印音乐歌谱……以资分布同志诸友及热心唱歌者”[11]。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早五点起。昨日因在校帮同人印乐歌,三点方罢,同人又笑语至四点,故睡时不过一点钟耳。……同人兴味极浓，余与仲清、聘三、希葛、成章皆力作至终者。”显而易见，这类朝气蓬勃的共同劳作能十分有效地团结人、提高人。恽代英自己也感奋不已,情不自禁地写道“:此次印歌谱及互励文，颇提起同人兴味。余自思就以往言，有三回有味时代……一为此次与互助同人作此等事……”[12]

在此基础上，互助社进入大发展时期。互助社原发起于中华大学大学部，但后来却在年轻单纯的中学生中有更大发展。那时许多学校尚无学生会组织，各校间也无正式联系渠道。互助社作为自发的学生组织，填补了空白，发挥了首创作用。各校渐有慕名来参观者、学习者，甚至有愿作通信会员者，在这种情况下，互助社的一些骨干分头建立了一些互助社的下属分支机构，恽代英创建了仁社，林育南创建了黄社，刘仁静也和汤济川等搞起了辅仁社……使得互助社逐渐成为武昌地区学校中有影响的组织。对此，恽代英欣慰地说：“近来社务内部既精神焕发，所向有成，外部又信用渐孚，此诚吾人之大幸”[13]，更重要的是互助社的精神由此浸润于各校，为学生运动走向统一作准备。当时就有人指出：“有此等会社，则各学校及学校间如有一种筋络，自然血脉流通。”[14]事实正是这样。不久，互助社就在武昌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和核心作用。

1918年5月，全国爆发了一场反对北京政府卖国、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这个协定是日本勾结段祺瑞政府共同出兵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可耻条约。中国留日学生首先站出来反对，到了5月，已形成全国响应之势。北京大学学生还召开了紧急救亡大会，决定向政府请愿。北京政府虽采取了加强邮检、扣留宣传品、不准报道等措施，消息还是传到武昌。互助社闻风而动，立即投入这一爱国运动，首先决定印反日传单。由于中日军事协定的内容秘而不宣，就整理已有材料，编成传单“日本新要求20条’进行揭发。为印传单，‘互助社数人捐款瞬满一千……实行之后，捐款如雨至”，恽代英十分感动，可惜“至印字局，因警察已通知彼等不准印’。[15]及“退与同人决议加油印20条千二百张，此外谋调查国货之进行。”[16]调查国货，为的是搞清哪些货是可代洋货之国货以及识别这些国货的方法，便于把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货的口号变为实践。互助社员曾分批多次出动，恽代英日记中就有“余偕养初（即刘仁静）出后花楼，至湖北街调查，晚六时乃回校”[17]等记载。经过广泛调查，由恽代英发起，并得到第一师范、外国语校、第一、二中学等响应，编印国货宣传品。后来还发展到筹建学生演讲团，准备游行演讲等等。就这样，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逐渐突破互助社以检束身心为内容的日常活动常规，使它面向社会迫切问题，互助社的面貌也就在时代潮流冲刷下逐渐改变。后来，它发展成利群书社，虽然还保留着劳动互助的外壳，却以传播新文化为主要任务了。

互助社的创建成长，可以看成是中国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摸索救国之道的一个缩影。在茫茫暗雾中，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汇集在一个有思想、有抱负、有热情、有能力的青年周围，力求上进。他们仅仅依靠单纯的向上要求就踩出一条通向历史主流的道路。在这个进程中，他们迈出的每一步，不管是前行还是反复、是明智还是可笑，都表现着他们那种单纯稚嫩的色彩，令人感奋。他们曾为表示坚决反日而决议一律剃平头，并解释这样做的原因说：“以吾等头发之剪式俗呼东洋装，吾等恶其名也。”[18]人们初看这种解释也许不免失笑，但体味一下恽代英的话：“饭后……剃头，更不用戴东洋头矣。此亦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之意也夫。”[19]想想他剃头后的满足感以及为这种心情找历史根据的心理，就不难看到潜藏在这明知幼稚却又抑制不住的反应后面的，是一种多么纯洁至诚的感情。

为了激励自已更虔诚参加生活检查会，他们制定了每会必静默、必诵互励文的刻板程式。想到他们坚持每会先静坐“数息一百次”，又齐诵互励文时，人们也许不免会为这里表现的某种宗教气息惊讶，但体味一下他们的互励文：“我平心静气代表我们大家说，以我们的良心作见证，我们今天来，为商量帮助自己，帮助

人家的一切事情及做这事情的一切方法。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出以我们的真心，不是空说的。”想想这些小青年自愿聚在一起，用一种不同于忏悔的静默、不同于念经的齐诵来表达自己的共同心声，就不难明白潜藏在这朴素语言后面的，是一种利用一切形式激励自己向前的可贵自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自觉没有停留在初级阶段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单纯表现上进要求的互励文也增添了国耻的内容。当他们高声齐诵增补过的互励文：“……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20]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把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新阶段。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正在一步步把他们引向水深浪激的中流。

最初的思想轮廓

刘仁静当然也随着互助社一起前进。互助社是 1917 年 10 月间成立的，刘仁静是 11 月 1 日加入的，到 1918 年 7 月他毕业离校，在互助社共有大半年时间，如果扣去寒假及因恽代英丧妻互助社实际陷入停顿的那两个月，他在互助社活动其实不到半年。这时期虽短，却恰在他步入青年展望人生的开端，因而互助社和恽代英的有益影响起的作用就分外大。在此之前，刘仁静只会闭门读书，经过“自助助人”的实践及恽代英的帮助，他迈出了准备进入社会的重要一步。

首先，他从单纯的个人奋斗进到联系社会去考虑自己的发展。恽代英曾勉励他：“吾社人人当以重大之责任自任，不当徒以之望人。”[21]他也确实出现了关心与帮助人的愿望，并努力到实践中

去学习互助。恽代英日记中就有他教刘仁静学会如何助人的一段话：“养初不能助竞华，且竞华畏而不敬之。余勉养初：（一）力求以自身操行示之模范。（二）对彼取放任主义，无论何事决不干涉，亦不讽刺。（三）使彼常助我，以我求助之心动彼求助之心。（四）常示彼我愿助彼之态度，使彼愿求助之时自然乐于求我。（五）常与彼为泛泛之谈，无一启口便与订条约或笑骂。（六）彼如愿求助时，务使彼自订其愿守之条约，且吾等监督只限其大者，不宜及其细事。(七)大处既已定约,必不容不神圣以履行之。”[22]这段话不仅显示了恽代英团结群众的胸怀心血和互助社摸索前行的艰难发展，而且提示了刘仁静是在什么情势下和什么导引中学步向前的，无论成绩如何，习惯于独自读书的刘仁静已开始认真学习与人相处和帮助人了。

其次，刘仁静也学了一些自强自励及待人接物的具体经验。恽代英不仅自己示范，从原则上教他“作事必求切实进行，计日程功’[23],而且还介绍具体作法“:评到自己所立之志,而每日或每星期一省察行事之合于所立之志否，如不合，用何法改之。常提醒此志，则可收立志之真效矣。”[24]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恽代英十分注意随时发现问题恳切指出。有一天，他早上与刘仁静等几人接触，感到刘有一些习气不好，晚上曾打算写信给刘指出，后经考虑仍觉得面谈为好，第二天就“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而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25]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刘仁静的进步当然不难想见。现在看来，他后来的发展虽不能简单说成是恽代英帮助的结果，但也确实不应忘记，正是恽代英促他把个人奋斗上进心提升到考虑社会国家的高度，使他有可能在革命洪流卷来时积极投身进去。不妨说，恽代英很好参与了刘仁静的思想基本建设，助他埋放了第一块柱石。

总起来看，在武昌求学期间，青年刘仁静的思想面貌已大体

形成轮廓，其中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他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如果说当年在互助社中林育南是以诚恳直爽赢得人们好感的话，刘仁静就是以有志用功给人深刻印象。恽代英对此也很欣赏，赞扬说：“养初亦勇猛精进，可以为师。”[26] “养初之向上、力学、忍让、助人，余所见唯一能预备将来者。”[27]正因为这些，恽代英比较看重这个比他小 7 岁的同人，和他讨论问题，有时甚至通过写信笔谈。刘仁静毕业去考大学时，恽代英也大学毕业、并受聘准备接管母校教务，恽曾表示希望“养初能养真才，将来为本校理科方面尽力。”[28]

刘仁静另一突出方面是年少气盛，常坚持己见，不能从全局着眼。如果说他有些毛病是未定型的青年的常见病的话，那么他主观偏执自以为是就是他既定性格中的基本成分。恽代英对此也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他“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29]“多争气,虽失不全在养初，然事不贵争，争气恐为将来之累，谏人未能委婉。”[30]刘仁静后来的发展证明恽代英确实看得很深刻、很准确。

刘仁静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是在认真准备高考中度过的。恽代英曾向人推荐说：“养初所作，是一好模范，彼久已为择校预备矣。”[31]当时京师大学堂虽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但仍有许多人把它看成是猎取功名找出路的最佳去处。刘仁静在父亲要求下积极准备投考这所著名学府。恽代英也花费许多时间给他多方面的帮助：从为他改中文英文作文到“高考学校选择法”，从介绍学习方法到介绍在北京的关系。1918 年 7 月 1 日，刘仁静在离校前最后一次参加互助社的话别会，恽代英为此事先准备到深夜。在会上对每个人都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诚挚的希望，对自己也作了回顾与剖析。会议开得较长，气氛也很好。对这次会议，恽代英写道：“同人亦久待我……后同人又牺牲一餐之饭，以竟听吾说，此后同

人又稍多互相规勉之意,,对于我,养初则以为宜注意要言不烦,此亦对症药也。”[32]会后,满载着互助社同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将来为本校理科方面尽力”的设想，刘仁静北上应考，走向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

注　　释

1 《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4 页。
2 同上书，第 147 页。
3 同上书，第 138 页。
4 同上书，第 139 页。
5 同上书，第 162 页。
6 同上书，第 163 页。
7 同上书，第 624 页。
8 同上书，第 180页。
9 同上书，第 191页。
10 同上书，第373 页。
11 同上书，第376 页。
12 同上书，第380 页。
13 同上书，第390 页。
14 同上书，第 384 页。
15 同上书，第 382页。
16 同上书，第 383 页。
17 同上书，第 387页。
18 同上书，第 386 页。
19 同上书，第 388 页。
20 同上书，第 159—160 页。
21 同上书，第 289页。
22 同上书，第 322页。

23 同上书，第 375 页。
24 同上书，第 359 页。
25 同上书，第 351 页。
26 同上书，第 187 页。
27 同上书，第 427 页。
28 同上书，第 425 页。
29 同上书，第 412 页。
30 同上书，第 423 页。
31 同上书，第 290 页。
32 同上书，第 42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